

公司税的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研究

苑新丽 /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公司税的 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研究

苑新丽/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分析外国直接投资(FDI)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公司税基本要素及其与 FDI 的关系,从公司税纳税义务、税率、税收优惠、国际协调和反避税管理角度分析 FDI 的效应,运用定量分析方法重点研究了公司税对 FDI 流入规模、产业(行业)分布、来源地构成的影响,探讨了 FDI 公司税激励的成本-收益问题。在对中国公司税税率水平和实际税率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两法”合并后 FDI 流入规模和方向的变化进行了预测。

本书主要以从事税收工作和与税收业务相关联的人员,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与外国直接投资相关的政府部门人员为读者对象,同时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和教师的教学参考用书。对于热衷于研究外国直接投资问题的科研人员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司税的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研究/苑新丽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3-023648-7

I. 公… II. 苑… III. 公司所得税-税收政策-影响-外国投资:直接投资-研究-中国 IV. F832.6 F8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5649 号

责任编辑:马 跃/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张克忠/封面设计:耕者设计工作室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蕾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5

印数:1—2 500 字数:320 000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明辉〉)

本书由
辽宁省教育厅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f Liaoning Province



序

《公司税的外国直接投资效应研究》是苑新丽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分析公司税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影响的学术著作。作为她的博士生导师，我对该书的出版感到欣慰，也向该书作者表示祝贺。

进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 FDI 达到空前的规模。公司税激励已成为主权国家吸引国际资本尤其是 FDI 的重要政策工具。该书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的公司税 FDI 效应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作者从 FDI 的一般问题入手，分析了影响 FDI 流动的各种税收因素和非税收因素，从理论分析角度揭示了公司税与 FDI 的相关性，从经验分析角度探讨了公司税纳税义务、税率、税收激励、税收协调管理等要素对 FDI 流入总量、结构产生的效应。该书选题角度新颖，体系结构完整，研究方法富有新意。

该书作者的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司税的 FDI 结构效应。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税优惠对 FDI 影响的利弊分析和评价，并认为在引导 FDI 流向特定地区方面，税收优惠政策有效。该书作者从公司税要素出发全面分析了公司税对 FDI 来源、形式、规模、产业及地区流向的影响等问题。

第二，影响公司税 FDI 效应的因素。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东道国税收政策对 FDI 的影响，而对与 FDI 有关的母国税收政策则很少论及。该书作者结合中国公司税政策实际，就母国税收政策对东道国 FDI 税收激励的影响进行

了一些有益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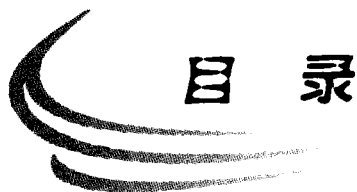
第三，公司税的管理与协调对 FDI 的影响。已有的研究集中在税收政策与制度层面，而对公司税的管理与协调的影响则很少论及。该书作者探讨了各国不同的反避税措施对 FDI 流入产生的效应，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的公司税国际协调和管理对策。

第四，公司税对我国 FDI 流入量影响的基本估计。“两法”合并前，有些学者曾对此进行过一些探讨。“两法”合并后，相应的研究还未进行。该书作者根据“两法”合并后的税收政策，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初步分析、判断和预测公司税对 FDI 流入的影响程度。

公司税的 FDI 效应问题是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博大的课题。它不仅涉及内流投资问题，而且涉及外流投资问题。在该书中，作者分析的主要是公司税的内流 FDI 效应问题，而较少涉及外流 FDI 效应问题。希望作者能在该书的基础上对公司税的外流 FDI 效应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丰富中国公司税的理论与实践做出更大的贡献！

马国强

2008 年 10 月



目 录

序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	6
第三节 研究结构与研究方法	14
第二章 FDI 基本问题分析	17
第一节 FDI 一般理论分析	17
第二节 FDI 及其新趋势	25
第三节 FDI 流动与税收因素的作用	37
第三章 公司税基本要素及其与 FDI 的关系	46
第一节 公司税基本理论	46
第二节 公司税与 FDI 的相关性分析	59
第四章 公司税纳税义务确定对 FDI 的影响	67
第一节 公司税纳税义务确定的理性分析	67
第二节 公司税纳税义务与 FDI 组建形式的考察	74
第三节 公司税纳税义务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	79
第四节 中国对 FDI 所得课税的税种与纳税义务选择	83
第五章 公司税税率对 FDI 的影响	91
第一节 公司税税率对 FDI 流入规模的影响	91
第二节 公司税税率水平对 FDI 流入形式的影响	107

第三节	公司税税率水平对 FDI 区位选择的影响	114
第四节	中国 FDI 所得税税率水平的审视	124
第六章	公司税激励对 FDI 的影响	134
第一节	FDI 税收激励的一般分析	134
第二节	公司税激励对 FDI 流入规模的影响	148
第三节	公司税激励对 FDI 流入产业分布的影响	152
第四节	公司税激励对 FDI 来源构成的影响	160
第五节	FDI 公司税激励的成本收益分析	165
第六节	中国 FDI 税收激励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175
第七章	公司税协调与反避税管理对 FDI 的影响	190
第一节	公司税国际协调对 FDI 的影响	190
第二节	反避税管理对 FDI 的影响	203
第三节	提高中国引进外资水平的公司税协调及管理建议	210
参考文献		222
致谢		231

第一章

导 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外国直接投资^①(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已成为当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长期以来,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出口国、进口国和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被西方学者称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20世纪60年代之后,FDI发展迅速,流量与存量急剧扩大,FDI资本流动正取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催化剂。我们看到,FDI不再是发达国家简单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剩余资本和发展中国家为追求资本的超额利润对发达国家进行反向投资。同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转让一样,这种国际FDI资本流动,是在市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主权国家,在全球市场宏观视角下配置经济资源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新形式。

进入21世纪后,FDI迅猛发展,主要流向仍是投资环境相对规范并充满高收益的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巨大的市场容量和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对国际资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比重有所上升。在这个阶段,FDI不仅超越了国际贸易成为国际经济联系中更主要的载体,而且超过了国际银行间贷款成为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中更重要的构成形式。

^① 在中国大陆一般称为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投资

FDI 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国际资本,它对东道国的经济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FDI 给东道国带来了金融资本,促进东道国的资本形成和东道国税收收入的增长,有利于新技能和新技术的引进。同时,FDI 有利于提高就业水平。据统计,跨国公司雇用了 600 万本国以外的员工,全球有 500 万人在出口加工区的工厂工作,大约有 1000 万人因这些特区的存在而获得了就业机会^①。

由于 FDI 对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有限的国际资本,纷纷降低对 FDI 的准入“门槛”,各国政府为吸引跨国公司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也使许多国家为投资商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激励政策。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7)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各国政府不断采取措施促进外国直接投资。1992~2006 年,世界各国共有 2451 项 FDI 政策改革。其中,2225 项是朝有利于吸引 FDI 的方向改进。仅 2006 年就出台了 147 项使东道国环境更有利于 FDI 的政策(表 1-1)。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占了其中的大多数(74%)。这些政策变化包括旨在降低公司所得税(如在埃及、加纳和新加坡)和扩大投资促进方面的努力(如在巴西和印度)而采取的特定措施。

表 1-1 1992~2006 年的国家管制改革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投资制度 实行改革 的国家数 目	43	56	49	63	66	76	60	65	70	71	72	82	103	93	93
管制改革 的数目	77	100	110	112	114	50	145	139	150	207	246	242	270	205	184
更有利于 FDI	77	99	108	106	98	134	136	130	147	193	234	218	234	164	147
更不利于 FDI	0	1	2	6	16	16	9	9	3	14	12	24	36	41	37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7 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

各国为 FDI 提供的激励政策有多种形式,通常被划分为两大类:融资激励和财政激励。其中财政激励主要是通过税收激励政策来实现的。其总体目标是降低外国投资者的税收负担。一般认为,税收很少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由于税收通过影响 FDI 的资本成本,进而影响 FDI 的收益,因而有证

^① A. Easson. Tax Incentives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4, Chapter 2

据表明税收激励在投资者做出选址决策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将变得更重要。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员国对“税收竞争”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就是明证。投资的决定一旦做出,投资商们就会“逛商店”——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税收激励政策常作为重要的一项被列到采购单上。为此,实施特殊的税收激励政策措施来吸引FDI已是各国的普遍做法,并成为世界性特征。贫穷的非洲国家倚重于免税期政策和进口关税豁免,而工业化发达的西欧国家则允许实行投资抵减或加速折旧。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受人瞩目的投资数目日增。Toyota(丰田)投资于法国北部,A. G. Mercedes-Benz(A. G. 梅赛德斯-奔驰)在美国阿拉巴马州进行投资,证明这种趋势似乎更加明显。

顺应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我国政府实施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我国当前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建设资金严重匮乏,为了缓解投资不足,利用FDI加快本国经济发展,自然也就成了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中国自1979年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利用FDI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1979~2007年,我国累计批准FDI项目632298个,实际使用FDI金额为7602.5亿美元^①,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之一,曾在2003年超过美国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推进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支持因素。

然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和现今的引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开放初期,我国是短缺经济,引进FDI的首要目的是利用资金,扩大出口,以解决资本和外汇缺口。而今,从资金市场看,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12月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5282亿美元^②。我国已由资金短缺转为资金相对充裕。从外商投资自身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虽已居世界前列,但也面临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的问题。同时随着外商投资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大,外资企业快速发展,使内资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如果及时调整我国利用FDI战略和政策,仍将引进利用FDI数量指标作为政绩指标,继续给予FDI企业超国民待遇,不考虑资金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显然对我国经济的协调、稳定、持续发展是不利的。

在以往的利用FDI政策中,税收政策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① 累计批准FDI项目数量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79~2006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行业数据

②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2-28

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需要,我国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由此带来了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税收规定上的诸多不同,对外国来华直接投资给予了诸多的税收激励,其范围之广、优惠之多,都是我国前所未有的。当然,内外资不同的税收政策是基于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服务于对外开放政策需要和适应对外开放战略格局演进而形成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对FDI实行的这种粗放型和超国民待遇的税收激励政策,在实践中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不仅导致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而且影响了内外资企业的公平有效竞争。而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关税大幅度降低,对外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商进一步加大了对我国的投资力度。相应地,这种负面影响更加严重了。

我国实行的对内外资企业不同税收政策的制度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引起学术界和政策界的关注。1994年,财政部着手对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进行调研,拟定“两法”^①合并方案。1997年金融危机过后,东南亚各国为了吸引外资,纷纷给予FDI各种优惠条件,而当时的中国经济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与我国同处一个经济区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影响FDI的重要因素上也逐渐和我国趋同,甚至在某些因素上比中国更具竞争力。例如,印度平均成本比中国更低,而其专业人才的质量绝不在中国之下,并且拥有和中国类似的亟待开发的国内市场。又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有非常不俗的经济表现,许多在中国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在这些国家开始实行,在当今全球经济大比拼的时代,真可谓“追兵四起”。而中国的原材料、能源、土地和人工等几项要素成本普遍上升,并且制度成本降低的空间也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外商在决定到哪国投资时,税收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而且,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也实行了很优惠的税收政策。例如,印度对于在自由贸易区成立的新工业企业、软件技术园或电子硬件技术园或100%出口导向的企业,从生产年度起前8年中任意选择连续5年全部免征所得税;韩国颁布的《外商促进法》规定,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领域的项目可以享受7年免税、3年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我国台湾省规定,生产型外资企业自经营之日起,5年免征公司所得税,企业扩大再投资可延长免税4年;越南对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从事基本建设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10%的税率,对从事重工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②。可见,我国主要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行税收优

①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② 钟伟. 企业所得税并轨对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当代财经, 2005, (6)

惠政策的力度相当大,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低,反映了这一地区通过税收吸引 FDI 日益激烈的竞争趋势。由于担心“两法”合并会削弱吸引外资的力度,酝酿中的合并方案就此偃旗息鼓了。2001 年中国加入 WTO,中国经济日新月异,但同时,国人日渐担忧在所得税征收方面处于劣势的中国企业一旦失去关税的保护将处于危险境地,由此,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的话题再度被推上了前台。但由于某些原因,“两法”合并工作再次搁浅。直到 2007 年 3 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两法”合并提案才得以正式通过。就税法而言,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参与面最广、酝酿时间最长、征求意见最多的一部法律。此番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特点是,对内外资企业实施相同政策规定,外资企业享受多年的“超国民待遇”将不再存在。

上述分析表明,FDI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而我国针对 FDI 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引人注目的焦点。中国对 FDI 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发展现状究竟如何?税收政策在中国吸引 FDI 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采用什么样的税收政策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尤其是内外资所得税法并轨后会对 FDI 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书深入研究公司税的外国直接投资效应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上,将进一步完善我国 FDI 理论框架,丰富和完善我国 FDI 税收理论研究及税收优惠效果研究的基本内容。公司税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 FDI;何种税收工具会对跨国公司的选址决策产生最大的影响,什么样的投资者最有可能对公司税税收政策的改变做出反应;母国和东道国的公司税税收政策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对跨国公司的 FDI 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资本流动障碍的逐渐消除加剧了各国政府在全球市场对 FDI 的竞争,公司税税收政策在 FDI 竞争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对公司税 FDI 税收激励的成本如何,特别是公司税对 FDI 结构有何影响……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对经济学中的国际投资理论、财税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博弈论等知识要有良好的修养,以确保研究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对我国利用 FDI 的现状 & 税收激励的效果做准确而完整的调查,从而真实把握我国利用税收激励政策吸引 FDI 的结构状况。可以想象此项工作的艰巨与庞杂,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我国还没有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为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企业所得税的 FDI 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对于不断完善我国税收政策体系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实践上,对 FDI 的研究,将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外资企业所得税政策的

正、负效应,重建科学的 FDI 税收政策体系,使我国的 FDI 税收政策更具完备性、科学性,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提高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我国的税收政策伴随着对外开放过程,在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及推动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对外资过于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导致了我国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影响了内外资企业的公平有效竞争。不仅如此,国内许多地方为吸引外资,展开了激烈的税收竞争,结果扰乱了国家统一的税收政策,加剧了财政平衡的压力和经济效益的损失,甚至助长了税收流失。为此,有必要对 FDI 公司税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一个客观、综合的分析与评价,为进一步完善 FDI 税收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更为重要的是,时值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的初期,对取消了众多外资税收优惠的新税法对 FDI 影响的分析与判定,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学者对 FDI 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从 FDI 流动决定因素角度分析税收对 FDI 流动的影响程度,二是从计量经济学角度研究税收政策对不同形式 FDI 的作用,三是从跨国公司角度解析 FDI 对税收政策变化的反应^①。

(一) 对 FDI 流动决定因素的调查

对 FDI 流动决定因素研究的方式之一是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国外大量调查研究文献表明,东道国经济和政治环境对 FDI 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这些因素具体包括: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规范的商业和法律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充足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自由的利润汇回机制、充分的争端解决机制及一定的激励政策。税收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 FDI 地点的选择,但它不是引致 FDI 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巴罗 (Barlow) 和温德尔 (Wender) 1955 年对 247 个美国公司进行了海外投资战略方面的调查访问。只有 10% 的公司将有利的外国税收作为 FDI 的一个条件,排在货币流动性、保证所有权不被剥夺、东道国政治稳定三个因素之后。

鲁宾孙 (Robinson) 1961 年对 205 个公司所做的调查结论显示: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对于什么是影响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存在很大分歧。税收优惠在政府的回答中名列首位,而这根本就不在私人投资者所列答案之内。

① 夏杰长,李朱. 税收政策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国外社会科学, 2004, (6)

阿哈诺尼 (Aharoni) 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的 FDI 决策方式进行了研究, 并于 1966 年发表了该领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 其结论是: 东道国政府的税收优惠并不能使得企业决定在该国投资。所得税减免只是一个微弱的刺激因素。1984 年, 30 国集团对 52 家跨国公司进行了关于影响 FDI 因素的调查。发现在 19 个被确定为影响 FDI 的因素中, 东道国的诱导措施在发展中国家排在第 7 位, 而在发达国家被排在第 8 位。

1987 年, 凯布尔 (Cable) 和波休德 (Persuad) 等学者对英联邦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结论显示: 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对一国总体吸引力的评价, 其中包括较大的东道国国内市场和该国所在的区域市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税收和金融刺激显得不太重要。

利佐多 (1990) 认为, 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一般是并存的) 可导致不利的投资环境, 法律或财政结构 (税收结构变化) 的巨大变化或者宏观经济环境突变 (通货膨胀急剧上升, 汇率大幅波动) 都可能降低 FDI 的预期收益, 影响 FDI 流动。

安永 (Ernst & Young, 1994)、日本外贸组织 (JETO)、《财富》杂志与德勤 (Deloitte Touche) 等采用不同的样本或设计更为详细的问题, 围绕税收政策对于吸引 FDI 的有效性进行了调查, 进一步论证了以上的论断: 即便税收政策能够发挥作用, 它也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地点选择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①。

1995 年 4 月,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对发展中国家外资激励政策效果的专项调查报告显示: 在决定直接投资地点时, 外国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否稳定, 其有关外国投资的法规是否完善, 其次是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发展前景、生产成本、工人技术水平及基础设施状况。只有当这些因素都具备的时候, 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才对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产生影响。

(二) 税收对 FDI 效果的计量经济分析

一些外国学者通过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税收尤其是税收优惠对 FDI 的影响, 得出了许多重要的论断。早期的大多数经济计量分析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主要受到市场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响, 税收政策对于 FDI 的选址没有太多影响。而后期的计量经济分析则表明税收对 FDI 有着较强的影响。

鲁特和阿姆德 (Root and Ahamed, 1978) 对 1966~1970 年 41 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根据每年的 FDI 人均资本流入量, 将这些国家分成 3 类: 没有吸引力的国家、中等吸引力的国家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国家。在

^① 雅凯·莫瑞塞特. 税收政策与税收优惠、如何影响外国直接投资. 李品一译. 税收译丛, 2003, (5): 14, 15

3类国家中,公司税税率被证实为一个有效的分辨因素,而税收刺激方面的法律和税收减免不是有效的分辨因素。同年,阿高督(Agodo, 1978)对20个非洲国家拥有46项制造业投资的33家美国公司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不是影响FDI流动的决定性因素。

在对税收影响FDI决策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面,哈特曼(Hartman)首先运用计量模型对美国的税收与FDI之间的关系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1981、1984、1985)。他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利用了美国1965~1979年税收与FDI时间序列数据,估计了FDI(包括由保留利润融资的投资和从国外转移来的投资)对以下三个变量的敏感性:美国的外国投资者实现的税后收益率、美国资本总体税后收益率以及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本的税率与美国投资者拥有的美国资本的税率之比。回归分析表明:两个税后收益率变量均同保留收益率再投资形成的FDI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率有正相关性;FDI/GNP比率同外国人拥有资本与美国人拥有资本的相对比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三个变量的系数均有预期的正号和足够大的数值。哈特曼的结论是:无论投资资金来源如何,税收对FDI的影响都很强。

博斯金和盖尔(Boskin and Gale, 1987)估计了美国1981~1982年税改后对FDI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是美国的FDI对税后收益率极为敏感,这次税改带来年均20~40亿美元的FDI增长。

费尔德斯坦和琼(Feldstein and Jun, 1987)使用收益率序列数据同时改善了有效税率的估计,对哈特曼1984年的回归方程做了新的估计,他们还将样本延伸到了1984年并以各种替代性的解释变量和函数形式进行试验,结果显示税后收益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相当于总的有效税率降低10个百分点)会导致FDI/GNP之比0.4个百分点的增长。他们的结论均表明哈特曼的研究结果是可靠的。

斯莱姆罗德(Slemrod, 1990)对哈特曼式的FDI总量模型加以了扩展和更新,他把流入美国的FDI的母国分解为7个国家,并用新投资的边际有效税率来取代平均税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美国有效税率对于总量FDI和资金的新转移额有负效应,但对以保留利润进行的投资没有负效应。但是当他把国家按照居民税收管辖权和地域(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来分组时,他的结论没有支持这两组国家间FDI的税收敏感性的显著差异。

格洛普和卡斯泰尔(Gropp and Kostial, 2000)的研究认为,以往的实证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非税收因素的影响。例如,低税国家通常不仅拥有对投资有利的税收环境,而且在其他商业环境上,如制度和法律上也对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收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成员国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

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预期经济增长率、预期真实汇率、经济开放指数、FDI 总量）之间的方程，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 FDI 流动的影响。研究表明，税率变化对 FDI 流动有着显著影响。法定税率平均每上升 10%，则会减少 0.3% 的 FDI 内流（以 FDI/GDP 表示），同时增加 0.2% 的 FDI 外流。也就是说，税率对 FDI 内流和外流都有明显影响，只是对 FDI 内流的影响更大。

表 1-2 列示美国关于税收对 FDI 的影响的一些计量分析研究成果，主要考察了税收对美国内流直接投资的影响。

表 1-2 税收对 FDI 影响的计量分析研究：美国的内流直接投资

研究者	方法(数据)	结论
Hartman(1994)	对美国的内流直接投资进行时间序列估计，1965~1979 年 BEA* 的每年数据(15 年)	通过留存收益进行的直接投资与美国的高税负相关
Boskin and Gale (1987)	对美国的内流直接投资进行时间序列估计，1956~1984 年 BEA 的每年数据(29 年)	通过留存收益进行的直接投资对相关税率的弹性为-1.7
Newlon(1987)	对美国的内流直接投资进行时间序列估计，1956~1984 年修正过的 BEA 数据(29 年)	通过留存收益进行的直接投资对税后回报的弹性为 1.1
Young(1988)	对别国在美国国内的直接投资进行时间序列估计，1953~1984 年修正过的 BEA 数据(32 年)	通过留存收益进行的直接投资对税后回报的弹性为 1.7
Slemrod(1990)	通过区分投资国别来估计它们在美国的直接投资，1962~1987 年调整过的 BEA 数据(7 个国家)	美国的高税收大大减少了通过新转移来的资金所进行的直接投资，而居住国的汇回税对其没有影响
Auerbach and Hassett(1993)	对外国人拥有的美国公司的资本构成进行横断面估计(1980~1990)(Compustat, 243 家公司)	享有国外税收抵免的投资者在 1986 年后没有表现出向设备密集型公司转移的需要
Swenson(1994)	时间序列估计税收对产业新投资的影响，1979~1991 年 BEA 数据(18 个行业)	1986 年期间投资对税收变化的弹性为 1.13
Coughlin, Terza and Arromdee(1991)	美国国内新建制造工厂的地点选择，1981~1983 年商业调查(736 个工厂)	税收作用不重要
Ondrich and Wasylenko(1993)	美国国内新建工厂的地点选择，1978~1987 年商业调查(1184 个工厂)	地址选择的概率对州公司税税率的弹性为-0.57
Hines(1996b)	美国内流直接投资的地点选择，根据投资来源国的税制区分不同的投资，1987 年基准 BEA(7 个国家)	州税率提高 1%，投资缩减 10%

资料来源：James R. Hines Jr. Tax Policy and the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 Taxing Profit in Global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美国经济分析局